# 导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托名之作 出于高人

《六韬》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六韬》旧本题作周吕望撰,《隋书·经籍志·兵家》即谓"周文王师姜望撰",以后各代都承袭了这一说法。这里所说的姜望,即吕望、吕尚,字子牙,俗称姜太公,是商周之际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西周的开国功臣,齐国的始祖。在周灭商的战争中,他先后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功勋卓著。由于《六韬》全书都是以太公答文王、武王问的形式编撰而成的,人们往往由此认定该书的作者为吕望,然而从宋代开始,直至近现代,经过许多学者考证,大都认为这部书并非殷周时代的吕望所作,而是后人托姜太公之名写成的。

从吕望所处的时代和《六韬》的内容来判断,这部书的作者不可能是吕望。首先,商末周初的战争实践和战争理论,还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可能总结出像《六韬》那样系统、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其次,当时作为表达工具的文字以及书写等条件,也不具备产生像《六韬》那样篇幅很长、内容丰富的兵书。古代虽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

的说法，但还未发现西周以前有像《六韬》那样的长篇文献。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鲁昭公十二年》），都是指最早的文化典籍于高阜、大丘被保存下来的意思。因为古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常有水患，稍有不慎，文献典籍就会被水毁掉，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千秋”，就是古代收藏文化典籍的一种方法。因此，文献要保存下来是很困难的。春秋时期，孔子在整理历史文献时曾感慨地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这说明商周文献保存下来的很少。第三，从《六韬》的叙述方式看，也不像姜尚一人之作。以问对形式探讨问题，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献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论语》、《孟子》、《管子》等先秦典籍大多是他们的弟子或后人记录、整理而掇辑成书的。《六韬》也属于这一类。第四，《六韬》有些内容，除讲到“避正殿”、“战骑”外，还论及到“铁拮（棒）”、“铁槌”、“铁斧”、“铁叉”、“铁杖”和“铁蒺藜”等兵器。在商末周初时尚无铁器可言，更谈不上铁兵器普遍使用于战场。因此，《六韬》不可能是商末周初的吕望所撰。

在探究《六韬》的作者时，往往怀疑周史是《六韬》的作者，其根据是《汉书·艺文志·儒家》中记有“周史《六弢》”一句，且有唐人颜师古作注：“即今之《六韬》也，盖

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同也。”其实,《周史六弢》与《六韬》是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不同性质的两部书。按照《汉书》的作者班固的说法,周史是周惠王、周襄王时人，或是周显王时人，显然周史其人必非太公。周史既为周代史官，或许他的先世亦当过周代史官，因而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有可能将他或他的先世保存下来的有关周文王、周武王与太公对话的记录，加以整理而纂辑成《周史六弢》。如果说《周史六弢》与《六韬》有关系的话，是否可推测为周史在传述太公之言方面起过一些作用,或许对后世兵家《六韬》的形成产生过一定影响,但绝不可能他就是《六韬》的作者。再说,《汉书》的作者班固按照自己的著录体例,把《周史六弢》列入“儒家”类,兵家《六韬》乃谈兵之作,不可能列入“儒家”类中。这说明《周史六弢》不是兵书，其中没有涉及论兵问题，只是一部儒家经典。第三,《汉书·艺文志》“兵家”类著录有‘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其下班固自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自伊尹以下各书,虽是兵书(或部分篇章为兵书),但在其他类中已经著录,故在‘兵家’类中就省略了。这就进一步表明《太公》是一部兵书，即太公兵法著作的总称。如若《周史六弢》即《六韬》,那么班固著录兵家时就应当列出《周史六弢》

一书,同《管子》、《孙卿子》等书并列。班固没有并列,再次说明《周史六弢》不是论兵著作，其中也没有涉及论兵的内容。

以上说明,吕望、周史都不可能是《六韬》的作者,其真正的作者很可能是战国末期颇具军事造诣的某人或数人托名姜尚所撰，而自己却隐了姓、埋了名。

众所周知，先秦的诸多古籍大多为托名之作，而非所托名者自著。精通古文的清代学者严可均认为，先秦诸子书几乎全系诸子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所撰。曾为《孙子》作注的余嘉锡说:"周秦诸子,类非一人之手笔,此乃古书之通例,又不独《六韬》为然。"(《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一)史志学家章学诚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以战国之人而述黄炎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托也，不知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文史通义·诗教上》)《六韬》虽托名姜尚,实非其自著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六韬》的作者为什么要托名姜尚呢 有的学者认为,《六韬》为战国时通其学者述太公之旧闻而著于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帛”是很有道理的。这首先是由姜太公不寻常的身世所决定的。姜太公，因其先世受封于今吕（今河南南阳市西）地，故名吕尚。又因周文王望贤人来归，得吕尚于渭水之阳，故又称太公望，遂立为师，遂佐文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所策划之事多为“兵权与奇计”（《史记·齐太公世家》）。继又为武王师，尊号师尚父，助武王率军东征商纣，倾覆殷商，建立周朝，姜尚遂为开国元勋。因此，后世都将周初的“阴谋”和“兵事”,归功于太公望及其“谋略”。司马迁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于是，后人把世代口耳相传有关太公望的谋略及言兵之事等旧闻辑录、加工、缀辑成书，并托名姜尚撰，就是很自然的了。

## 二 成书战国学界共识

《六韬》成书的时代,在研究者中,有春秋、战国中期、秦代、秦汉之际等多种说法,而大多数学者认为成书于战国末期较为符合实际。

首先,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后期冶铁术的进步为镌刻大部头书籍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从春秋末到战国,由于“铁”作为一种神奇的物质而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并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铁器的普遍使用,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大发展。人们有可能用一种硬度较大的铁制的“刀笔”,把历世的“史事”镌刻在木、竹简牍上。又因历世有大量的史事有待整理,于是就出现一种称作“刀笔”的官吏专司其事。《战国策·秦策五》记载说:“臣少为刀笔,以官长而守小官。”这就为人们镌刻像《六韬》这样的长篇著作提供了客观物质条件。

第二,战国时期丰富的战争实践,是产生《六韬》的社会基础。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战国时代,大国争霸和兼并战争十分频繁。周初时有 1200 多个封国,由于接连不断的战争,到春秋末只剩下晋、鲁、燕、齐、中山等十余个诸侯国;战国时则形成了秦、齐、楚、燕、韩、赵、

魏七强并立的局面。这时期，由于各诸侯国先后建立起封建政权,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不平衡,首先强盛起来的诸侯国，便不断地向外扩张势力，东征西战，攻城略地,争夺人口,掠取财富,以求称霸中原,因而爆发了频繁而无休止的兼并战争。这些争霸战争较之春秋以前的兼并战争,规模大,参战兵力多,战争范围广、容量大,延续的时间长，作战方式不断变化，出现了步战、骑战及车、步、骑协同作战的样式,同时野战、攻城、水战、山地作战等战法也更加丰富发展。因此，这时期的军事理论、军事思想也随着兼并、争霸战争的发展而发展。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才有产生像《六韬》那样思想内容很丰富、综合性很强的军事学术著作的可能。

《六韬》对骑兵、骑战及车、步、骑协同作战实践经验的总结，鲜明地体现了战国末期的时代特点。商、周时期的作战样式单一，主要是车战。春秋时“毁车为行”(《左传·昭公元年》)的变革,出现了步战,但仍以车战为主。战国开始，逐步变为以步战为主。赵武灵王（公元前 325 至 299 年在位）“胡服骑射”(董说《七国考·赵兵制胡服骑射条》)始用骑兵,从此骑战登上战争舞台,于是出现车战、步战、骑战并用，及三兵种协同作战的样式。仅就《六韬》总结出的丰富、系统的骑兵作战经验而言，它不可能成书于战国中期或战国中期以前。春秋时的兵书《孙子

兵法》和《司马法》并不曾言骑战,这是由它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决定的。《吴子》始言骑战:“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吴子·励士》)然而它只是初步地总结和论述了在三种情况下，即在与强敌相持，以及谷战、水战中，骑兵的作战运用。《孙膑兵法》也只论述了运用八阵与敌交战,有骑兵参战时的战法。《六韬》则详尽、系统地论述了骑士的选拔、骑兵的编制方法和在不同条件、不同情况下骑兵作战的战术运用，以及与车兵、步兵协同作战的方法。其中论述骑兵作战的“十胜”、“九败”,是战国时期骑兵实战经验和教训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具有很高的战术思想水平。它论述的“战车”、“战骑”、“战步”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正是战国末所普遍采用的车、骑、步协同作战战术原则的反映。

此外，这时期的战争结局，往往取决于各诸侯国内部的社会改革成效和国家实力的强弱，即封建经济、政治的发展状况和军队的素质、武器装备的改善程度、军事学术水平的高低、军事思想的先进与否。因此，各国诸侯为了谋求战争的胜利,他们除了采取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富国强兵”措施外，无不注意总结战争实践经验，发展军事学术。这就要求人们既要继承和整理历世的军事遗产，又要记录和编纂当时一切有关战争的资料和文献。兵书《六韬》的问世,也就势所必然了。

第三，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成就，是产生《六韬》的理论基础。这个时期，由于社会的大变革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新兴的地主阶级和新的政治集团逐步形成，反映各阶级、政治集团和各种政治势力不同政治见解和思想观点的知识分子，便纷纷著书立说，探讨各种问题。于是诸子蜂起，议论纷纭，产生不同流派，各派之间又相互辩争，从而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学术思想界的“诸子百家”。其中最著名的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和兵家等。在此情况下，追述、记录、整理各家学说的诸子作品相继出现，并程度不同地论及兵学，兵家著作如《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也应时而生。在先秦诸子中，荀子、韩非子对《六韬》的成书影响较深。例如，《荀子·君道》认为，为君之道在于爱民，不爱民则不能用民，不能用民则战必败、国必危；《议兵》篇又说：“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爱民”；“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六韬·文韬·国务》则吸收了这种爱民思想，并加以具体化，认为治国之道“爱民而已”；又说：“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有的学者还指出：《六韬》书中也有法家的权术观念。《上贤》篇中说：“夫王者之首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

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这里所说的高居远望、深视审听、隐匿真情，即战国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权不欲见”的无为观，也即是法家“法术势”理论体系中“术”的思想核心。[①]《六韬》正是吸取了先秦兵学及诸子论兵的精华，而成为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兵书。

第四，《六韬》的军事理论内涵和周灭商的战略、策略思想及其历史事实是吻合的。《六韬》全书特别是《文韬》、《武韬》所阐述的太公辅佐周文王治国强兵的思想和灭商筹谋，及协助周武王出兵伐纣的理论与史载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史记·周本纪》载周灭商前，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表明文王暗中收揽民心、联络诸侯，从政治上进行灭商准备。《六韬·虎韬·发启》说：“王其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又说：“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太公阐发的这些思想，与文王灭商的准备工作也相一致。周武王九年：“东观兵，至于盟津”；“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都说可伐纣，但武王认为灭商时机不成熟，乃率师返回（《史记·周纪》）。《六韬·文

①张烈：《〈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历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韬·兵道》论述用兵之道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并借黄帝之口说:"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这就说明观兵盟津,只是灭商前的一次军事演习,旨在会盟诸侯,统一周军和诸侯军队的意志,进行灭商动员。到十一年,武王认为灭商时机成熟,"用之在于机",乃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纪》)

在商郊与纣王决战,周军作战勇敢,"显之在于势",使商军中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阵前起义,"倒戈相向",大败纣王而灭商。又如《六韬·龙韬·论将》论述为将的条件有五材:勇、智、仁、信、忠。其中以勇为首,反映了商末周初时期的选将标准。因为当时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简单,战争规模小,时间短,胜负立即可决,作战以勇敢杀敌是时代的要求。在《军势》篇中,论述行军破敌"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喻其神速,攻之而不可御。牧野之战即是这种"兵贵神速"理论的运用。

第五,《六韬》引证的其他兵书的内容,印证了它只能是战国末期的作品。从春秋进入战国,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参战兵力的增多,武器装备的改进,作战双方的伤亡也随之增大。这就对作战指挥以及军队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战国前、中期的兵家十分强调将帅的作

用，主张加强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战国前期的兵书《吴子·论将》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战国中期的兵书《尉缭子·将理》说："凡将，理官也，万物之主也。"其《攻权》也说："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六韬》则吸收、发展了这些思想，在《龙韬·奇兵》篇中说："将者人之司命"；"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战国中期的兵书在论述将帅修养时，都认为将帅的"贪"是导致战争失败的祸根。《孙膑兵法·将败》说："将败，四曰贪于财。"《尉缭子·十三陵》则说："祸在于好利。"《六韬·龙韬》有专篇论将，指出"贪"是将帅的"十过"之一，对贪而好利的将帅，可以贿赂他。《吴子·治兵》中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强调将帅在作战指挥时，必须果决，切忌优柔寡断，是为后世兵家所称道的至理名言。《六韬·龙韬·军势》引用了这句话，只是将"生于狐疑"改为"莫过狐疑"而已。《尉缭子·武议》论述将帅必须兵权专一时，说："无天于上，无地于下，于主于后，无敌于前。"《六韬·龙韬·立将》则专论"立将"之道，指出将帅受命出师后，"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并完整引用了《尉缭子》的话，只是在字句上前后有所变换。《吴子·治兵》中所论述的教战法，即"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

千人学战,教成万人 万人学战,教成三军 ”。在《六韬》的《教战》篇中被原原本本地引用。另外，战国前期以后，古代哲学上的阴阳五行说，开始运用到军事学术领域。《孙膑兵法 · 行篡》中说“ 阴阳,所以聚众合敌也 ”;在《奇正》篇中又说“ 有胜有不胜,五行是也。”《六韬 · 龙韬》则以《五音》专篇更详细、更具体地论述了这种思想，认为“ 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敌，金木水火土，各以其胜攻之 ”。又说“ 五行之符,佐胜之征,成败之机。”从以上可以看出，《六韬》吸收了战国前、中期兵家的论兵思想，反过来又可以印证它只能成书于这些兵书之后，而不可能在此之前。

第六，《六韬》中提到大量铁制兵器和农具，说明它不可能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六韬》论及铁兵器、农具达 30 种之多,诸如方首铁掊(棒)、方首铁槌(又称天槌)、大柯斧(又称天钺)、铁螳螂、椓杙大槌(铁鎒头)、方椓杙矛、鹰爪方胸铁耙、方胸铁叉、方胸两枝铁叉、委环铁胸、环利铁锁等，在战国中期以前的任何兵书中都是不可能的。从春秋末到战国，人类虽已进入铁器时代，但在战场上大量使用的仍是青铜兵器。因为此时铁还是一种珍贵的稀有金属，用于装备部队的铁兵器少，其种类则更少。这是由于铁矿的发掘、开采、冶炼等依然受到当时技术和生产水平的限制，铁的产量还远远不能满足军事领域的需

要。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只有到战国中期以后，铁兵器的种类和数量逐步增多，才有可能较普遍地装备部队。战国前期，中原各诸侯国的军队虽然已逐步使用弩，但是只有到战国中期以后，各国军队才普遍地装备了弩，并被称为当时最具杀伤力的进攻性兵器之一。到战国末期，一种更为先进的、可以连发数箭的“连弩”才出现于战场。而《六韬》所论及的‘绞车连弩’,是将‘连弩’用绞车张弓发射，射程更远，威力更大，更说明它是战国末期的兵器了。

第七,地下文物的出土,验证了对《六韬》成书于战国末期的推断是成立的。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古墓中出土的汉人手书竹简中，有《六韬》并明确标有《文韬》、《武韬》等卷名,与传世本《六韬》相同。1973 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六韬》。这两处出土的具有十分重要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文物，充分证明《六韬》早在西汉初期已有定本，并广泛流传。

应当指出，《六韬》不一定是出自一时、一人的手笔，它的形成很可能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由多人、多次整理、逐步完善而成的。姜尚与文王、武王之间所言之“阴权”与“兵事”，最初只是世代口耳相传，后由史官记言、记事，再经史官或兵家不断加工整理，内容越来越充实、丰富，直至把以往的成果全部辑录起来，进行系统的

**编纂，最后才形成《六韬》这部具有独立思想体系、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时代特点鲜明的兵书。所以应当说，《六韬》是多少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 兵家集成

## 内容宏富

《六韬》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等 6 卷、60 篇。所谓“韬”与“弢”字相通，原指“弓套”，含有深藏不露之意，后引申为谋略。“六韬”，就是指论述战争问题的六种韬略。简单地说，前两卷重点阐述战略问题，后四卷则重在阐述战争指导的一些重要原则及战术、技术问题。就全书来说，可以称之为先秦兵学集大成之作，内容宏富，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战略、策略、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与国防动员、参谋业务与保密等问题，体系完整，包罗万象，堪称我国先秦时期兵学发展的集大成之作。其中不少观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并对现今仍有启示。

第一，在战争观方面，主要阐述了战争的性质和作用。《六韬》认为，战争是解决阶级和阶级、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的一种形式。“禁暴乱，止奢侈。”（《文韬·上贤》）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该书揭露了商纣王的暴虐统治，旨在说明：只有诉诸武力，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推翻奢侈无度的殷商奴隶主贵族的腐朽统治。另一方面，作者撰写此书时，已经是新兴地主阶级取得并巩固政权的战国时代。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